

时局、诗学和 意识形态的碰撞

——《富国策》译介与传播的社会翻译学研究

*Situation, Poetics and Ideology: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of Fu Guo Ce*

刘晓峰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助

时局、诗学和意识形态的碰撞

——《富国策》译介与传播的社会翻译学研究

刘晓峰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局、诗学和意识形态的碰撞：《富国策》译介与传播的社会翻译学研究 / 刘晓峰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3.2

ISBN 978-7-310-06329-1

I. ①时… II. ①刘… III. ①西方经济学—翻译—研究 IV. ①F0—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212168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时局、诗学和意识形态的碰撞

——《富国策》译介与传播的社会翻译学研究

SHIJU, SHIXUE HE YISHIXINGTAI DE PENGZHUANG

——《FUGUOCE》YIJIE YU CHUANBO DE SHEHUI-FANYIXUE YANJIU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陈敬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https://nkup.nankai.edu.cn>

河北文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23 年 2 月第 1 版 202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18.25 印张 2 插页 254 千字

定价：92.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8339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缘起	1
1.2 研究对象、目的和研究问题	4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5
1.4 研究价值	14
1.5 本书框架	16
第 2 章 《富国策》翻译研究现状	18
2.1 经济学思想（史）为主题的研究	18
2.2 翻译（学/史）视角的研究	21
第 3 章 《富国策》的翻译场域	30
3.1 《富国策》翻译场域权力关系及主要行动者	30
3.2 晚清诗学规范	68
第 4 章 《富国策》译文的形式特点	77
4.1 中译本《富国策》和其底本 <i>MPE</i> 的整体对比	78
4.2 文本微观语言特点以及“道、理”概念和儒家文化负载语	91
4.3 句法特征	106
4.4 <i>MPE</i> 与《富国策》的文本性对比	119
第 5 章 《富国策》经济思想的译介和接受	145
5.1 经济学术语译介考察	145
5.2 《富国策》对 <i>MPE</i> 经济学思想的译介和删节	152
5.3 经济思想的传播和影响	195

第6章 《富国策》翻译策略、翻译规范和译者惯习	219
6.1 基于功能的翻译策略再范畴化	219
6.2 《富国策》的翻译策略	226
6.3 《富国策》翻译规范、翻译策略和其译者惯习的关系	238
6.4 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思想根源	245
第7章 结论	259
7.1 研究发现	259
7.2 研究创新	264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266
参引文献	267
后 记	284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缘起

19 世纪中后期，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①。为了求强图存，洋务派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引进西学的翻译活动^②，并形成了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为主的两大翻译中心。本书所聚焦的《富国策》中译本，就于 1880 年诞生在京师同文馆。这些翻译活动引进的西学，对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有很好的教育启蒙意义，对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之间的中国社会变革起到了不可

① 洋务重臣李鸿章 1872 年 5 月上书同治帝《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时慨叹“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梁启超，2015：50）

② 早在同治七年（1868），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曾国藩就在奏折中指出：“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秘，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中国史学会，1961：79）同治十年（1871）初，曾国藩奏折中又称，“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中国学外国之技，则须以翻译为第一要义，得洋人一技之长，始明其迹，继探其意，既乃翻译汉文，使中国人人通晓，可见施行”。（曾国藩，1988：7191）

替代的催化作用^①。

洋务派的翻译活动涉及范围广泛，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数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工、兵学、机械制造、医学、农学、冶金、地质学、地理学、天文学、语言学、外交学、法学等诸多领域，如此大规模的译入活动，堪称史无前例。这些翻译活动都有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无论研究哪一阶段哪一部分都要结合其复杂的背景因素，否则研究者所做的阐述和得出的结论都有可能是以偏概全甚至是错误的。比如，在对比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译书时，熊月之认为两者“译书方法相同，都是西译中述，即由外国学者口译，中国学者笔述”，并且总结道：“两者相比较，无论译书数量，还是译书质量，京师同文馆都无法望翻译馆的项背。”（熊月之，2011：413）这里除了对翻译模式的概括总结欠妥之外，对两大翻译中心的对比和评价也是粗线条和有失公允的，因为熊月之没有具体考察每个译本的文本质量，也没有具体考察每个门类每一种译书产生的背景和过程及其对当时和后世的贡献，而仅仅通过译书数量来比较是难以得出中肯结论的。在如此复杂的国内国际翻译环境下，具体到每一领域的翻译情形都会不同，比如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京师同文馆翻译的《富国策》的贡献就比较突出。沈福伟就认为：“在1902年严复将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原富》译文正式发表以前，《富国策》在中国知识界被认为是一本讲商情商理最为透辟，讲理财学繁简得中的佳作。《富国策》宣扬的经济思想被一些维新思想家所吸纳……，在清末10多年中，一直被当做新式学校的教科书加以推广，其社会效益远较《原富》为广。”（沈福伟，2003：113-114）

^① 叶晓青认为：“洋务运动在军事、经济方面的直接结果虽然令人失望，但就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来说，它对当时和其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我们不应割断历史。如果没有洋务运动，当时近代科学技术就不会那样大规模引进，社会风气就不会那样迅速改变，新的政治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就会更加迟缓，其后的维新运动恐怕也缺少一个酝酿和准备阶段。”（叶晓青，1982：17）

洋务派的翻译活动是有政府背景^①的，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有复杂但是相对固定的赞助人体系和颇具特色的译者群体，也有颇具特色的文本表征。但到目前为止，对洋务派翻译活动^②这些方面的研究阙如。在仅有的研究中，传教士翻译活动一直是重点。这些研究，有的从史学角度进行史料梳理，如王红霞（2006）、胡照青（2007）、夏晶（2012）；有的从译介学角度切入，专谈西方传教士在晚清“西学东渐”中的翻译贡献，如何绍斌（2008）；有的从宗教学视角切入，如龚昊（2013）；也有个别研究从某一个译者或某一翻译文本切入，考察该翻译活动及其贡献，如杨焯^③（2015）。

《富国策》翻译研究现状亦是如此，该研究目前基本停留在思想史视角下外国经济学思想的译介讨论上，在翻译史研究层面仅仅有一般常识性的译者、译作和文本内容介绍，底本、翻译方式的争论以及一些翻译技巧的罗列例证，其中也有一些研究结论值得商榷，如《富国策》的译者问题^④。这些成果虽在某一方面对洋务运动期间翻译活动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但都没有基于译本深入挖掘译者、译本、赞助和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把微观的翻译文本和宏观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只有全面细致地描写每个特定

① 王克非在论及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时指出：“19世纪中叶，中国政府机构也开始从事译书工作，因而翻译的趋势有了很大的转变。这时期的显著特点，是政府主办译事，人们亦了解到西方科学知识的重要。虽然西方的观念对于既成秩序含有潜在的危机，但西洋的技术对于国防的需要，更是急不容缓。因此，译书的动机，多半由于政治和经济利益所促成。”（王克非，1997：169）

② 因为在洋务运动中，主持引进西学的翻译活动的发起人、赞助人和委托人等都是洋务派官员，译者基本都具有洋务官员的身份或最终获得了官员的身份，且围绕相似的翻译主题，大体遵循统一的“师夷之技”指导思想，所以，本书把这一类翻译活动统称为“洋务派翻译活动”。

③ 严格说来，杨焯（2015）研究的丁韪良《万国公法》译本不属于洋务派翻译成果，因为尽管《万国公法》在出版前经过了洋务派的两轮审查润色，但在丁韪良接任同文馆教习时，他已经翻译好《万国公法》了。

④ 译者问题是研究译本首先要回答的。《富国策》的译者问题比较复杂，有人（如张登德，2006）认为是汪凤藻独立翻译，有人认为是丁韪良和汪凤藻合译（如付德元，2010），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也未见有人从翻译学的视角讨论过这个问题。虽然《富国策》凡例中丁韪良承认是其学生汪凤藻翻译并经过其详细核对，但本书觉得这个副文本记录不可靠，丁韪良这样说只是个策略。下文会有具体的论证。

的译本，才能归纳出那个特定时代的翻译活动与社会因素的关系，书写真实的翻译史，故译本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

1.2 研究对象、目的和研究问题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富国策》的翻译。《富国策》是京师同文馆师生丁韪良和汪凤藻合译的一部经济学著作，其原文为英国剑桥大学亨利·法思德（Henry Fawcett）教授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提要》（*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1874年版。本课题研究范围包括其译者、赞助人、发起人、出版者和读者等行动者和晚清文章学规范，还包括底本选择、翻译目的、翻译策略、译本的文本特征、译本诞生后的文本性变化及其社会建构。当然，京师同文馆是独特的教学和翻译机构，所以京师同文馆的整体翻译史料会作为背景材料，为描述和论证《富国策》的翻译服务；与汪凤藻和丁韪良直接相关的翻译材料如《公法便览》《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英文举隅》（*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or the Use of Schools*）^①等的译本情况将作为参考资料。另外，《富国策》翻译活动的总赞助人洋务派群体的指导思想，以及当时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和宗教背景，也在取证范围之列。

本书的研究目的：描述《富国策》的翻译背景、文本特征，揭示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及其背后的深层社会动因。基于此，本书提出如下四个问题：

1. 《富国策》翻译场域有哪些特点？
2. 《富国策》汉译本的文本形式^②呈现了哪些特征？

^① 根据张旭考证，此书是汪凤藻依喀尔氏（Simon Kerl，西蒙·柯尔）的英文语法著作第二十一次刊本编译的，由同文馆印行，光绪十三年（1887）蜚英书馆又版，这是京师同文馆外语教科书中最引人注目的著作，也是中国近代由中国人编译出版的第一部英语语法书（张旭，2014：56）。

^② 本书中的“文本形式”是相对于其表达的经济学思想内容而言的，凡是经济学思想内容以外的载体，都被称为“文本形式”。

3. 汉译文本对经济学思想的译介有哪些特点，具体有哪些影响？
4. 《富国策》翻译场域中，其文本形式和内容特征体现了译者采取了哪些翻译策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本书主要采用文献法、副文本分析法以及原文和译文的平行文本对比法。主要理论基础是社会翻译学，辅之以描写翻译学、文化翻译研究、篇章语言学中的文本性理论以及晚清的文章学等。

1.3.1 研究方法

文献法：从散见于历代的文献中，搜寻对《富国策》的零星研究观点和评论性的文字，综述现有的研究成果，确定研究范围和切入点。同时，洋务派翻译活动期间积累了大量的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外交的史书、自传、书信、奏折、上谕和现有的研究成果文献，本书要把梳这些文献，描述《富国策》翻译活动的重要背景和影响因素，支撑观点的提出和论证。

副文本分析法：《富国策》本身有比较丰富的“序”“凡例”和“页边提要”等副文本资源，根据杰拉德·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①，这些资源也是破解《富国策》翻译策略的重要突破口。

平行语料库对比法：基于原文和译文的平行语料对比法是本书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笔者手工建立原文和译文的平行语料库，编制了删除、增添和改译三个范畴的符号标注系统，以章和每章中的段为基础，进行章对应、段对应和句对应，对平行语料进行人工标

^① 杰拉德·热奈特 (Gerard Genette) 把副文本 (paratexts) 分为内文本 (peritexts) 和外文本 (epitexts)，前者指出版者和作者所提供的与正文本共同出现的文本，如标题、副标题、化名、导语、致谢、前言、后记、封面、封底等；后者指所有那些单独流传在现实或虚拟世界中的副文本，如出版者或作者所提供的市场推销传单、别人书写的综述和评论等（转引自 Munday, 2016: 242）。本书把正文以外的内容均看作副文本，包括封面、前言、后记、目录、序、凡例和页边提要等内文本，以及别人书写的综述和评论等外文本。

注。运用对比语言学方法并辅之以文本细读，确定译者删除、增添和改译的具体内容，再结合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的微观语言特征，及译文字数和原文词数比等方法，系统描述译文的形式特征以及译入的西方经济思想方面的内容特征，为分析和归纳译者翻译策略以及背后的社会原因分析提供全面的描写。

考虑到19世纪上半叶《政治经济学提要》的英文底本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下文称 *MPE*) 已经比较接近当代英语，而其中译本《富国策》语言为文言语体，两种语言形式差距巨大，如洪堡(1826)就认为汉语自成一类^①。本书在平行语料库标注时采用了图里(Toury)的比较“单位(units)”概念。图里指出：“单位务必与我们大脑中的比较研究相关，仅临时作为译语投射到原语对应的部分。而且，若要使得比较无可非议，单位的选择不能单方面孤立地进行，必须要使译文和译文互参，然后才能确定。——而且，相比较的两个部分也没有必要非得处于同一级阶或语言层次，不然，对比就会滑到某一并不想要的窠臼中。”(Toury, 2001: 89) 基于图里的这一观点，本书标注“单位”确定三个观察模式：1) 原文基于段落的整体信息结构与译文中对应信息结构整体的相互参照；2) 原文的信息点和译文的对应信息点的相互参照；3) 原文信息顺序和译文中的信息顺序的相互参照。

具体判断和标注的步骤为：第一步，阅读原文某自然段，然后在译文里确定相应的对应信息段(相互参照)；第二步，阅读原文的句子和小句，确定信息点(可能是小句、句群或两者的混合等)，然后在译文里确定相应的对应信息点(相互参照)；第三步，以原文段为单位标注信息点顺序，在译文里相对应的信息点标上同一顺序；第四步，根据制定的标注符号，对每章中每个语段的“增、减、改”

^① 1826年3月20日，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在柏林科学院宣读其论文《论汉语的语法结构》时说：“汉语的语法结构是极为独特的，从所有语言的语法差异来看，汉语可以说自成一类，而不是某一种具体语言的亚种。”(2011: 119)考虑到语言发展的相对稳定性，就近现代英语与中文文言文的差异来说，洪堡的汉语观对本课题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情况按照切分的“单位”进行标注（语段切分根据分析的便利性而定，不漏过任何语段，这样的切分不会产生遗漏）。如第一卷第一章第一段的第一次删节就可以标为 B1C1P1O1（Book 1 Chapter 1 Paragraph 1 Omission 1），第一次增评可以标为 B1C1P1A1（Book 1 Chapter 1 Paragraph 1 Appraisal 1），第一次改译可标为 B1C1P1C1（Book 1 Chapter 1 Paragraph 1 Change 1），以此类推。删节标注在原文栏，增改标注在译文栏，并在分析栏使用相对应的标注代号，对此标注进行翻译文本形态描述和策略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删、减、改”只是译者翻译策略选择中最易发现的部分，也是本书考察译者翻译策略的起点，最后的翻译策略总结不在此限。具体步骤是：首先，在对平行文本中“删、减、改”进行表征标注的基础上，笔者在平行的另一栏内，进行微观的翻译特点描写，并分析译者的翻译策略。本书将对整个平行文本作段落对齐，以保证对译文整体的翻译策略的考察和翻译策略讨论的客观性；其次，对第一卷平行文本作更详细的“单位”对应，实现整体考察与局部考察相结合，尽量全面把握翻译文本和译者翻译策略的特点；再次，结合先前对《富国策》翻译场域内相关规范因素的分析，以及译者对这些规范因素的内化形成的惯习，对《富国策》的形式和内容特点进行观照，分析和归纳译者的翻译策略，最后提炼和揭示译者使用这些倾向性策略的根本社会动因。

另外，在考察《富国策》译介的经济学术语时，本书还使用了在线语料库 CCL（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古代汉语部分语料。

1.3.2 理论基础：社会翻译学

当今翻译学和社会学建立的社会翻译学^①研究已逐步走向成熟，其基本概念系统正在逐步完善。为研究方便，笔者在布迪厄社

^① 学界有翻译社会学和社会翻译学两种说法，但是考虑到翻译学科的本体问题，本书沿用霍姆斯（Holmes, 2007: 72）认为更精确的社会翻译学（socio-translation studies）说法。

社会学部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结合翻译学部分概念，提出了社会翻译学部分基本概念系统，并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而为本书的研究服务。

1.3.2.1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哲学界一直存在主观主义和客观性主义的对立，非此即彼。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提出了“结构的建构主义”（布迪厄、华康德，2004：67）。在他看来，一方面，主体性受结构的影响，结构对主体性的发挥有约束性；另一方面，主体性可以能动地建构社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修正甚至突破结构。布迪厄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践和体验的基础上的，最初就是为了解决这种主观与客观、结构性与主体性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哲学问题。他的社会实践理论超越了社会物理学^①与社会现象学^②的对立，综合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途径（同上：10-11），是“结构主义的建构论”和“建构主义的结构论”的结合。布迪厄的社会学是总体性的社会科学，一方面摒弃了机械结构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有效资源的分配情况建构了社会行动者具有的各种客观的位置空间，从而用一系列的范畴规定了行动者在社会层面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者通过自己的直接体验，运用社会活动中已有的范畴，从其内部建构其行动的各种知觉和评价，即各种性情倾向的范畴，这些行动者的性情倾向会随其在客观的社会空间所占据位置的不同而发生根本的变化。

布迪厄社会学用于翻译研究最多的是其定义的场域、惯习（habitus）、资本、幻象（illusio）、轨迹（trajectory）等概念和范畴。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成熟，主要代表人物有西米奥尼（Simeoni，

① 社会物理学将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的结构，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可以无视居于其间的人们的各自看法而从物质上观察、测量和勾画这种结构的关联与结合。这种立场是客观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布迪厄、华康德，2004：7）

② 与结构主义的客观主义导向正好相反，社会现象学认为具有资格能力的社会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里有组织的、富于技巧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建构他们的社会世界，而社会现实就是这些“持续不断的权宜行为所成就的”。社会就像从这些个人的决策、行动和认知中涌现出来的产物。（布迪厄、华康德，2004：9）

1998)、古安维克(Gouanvic, 2002; 2005)、布鲁玛特(Blommaert, 2005)、盎基莱莉(Inghilleri, 2003; 2005a; 2005b)、塞拉-谢菲(Sela-Sheffy, 2005)、沃尔夫和富卡里(Wolf & Fukari, 2007)、塔加维(Taghavi, 2009)和沃尔夫(Wolf, 2013)等。较早将布迪厄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的是西米奥尼。在近八年研究的基础上,西米奥尼(Simeoni, 1998: 1-39)发表了关于译者惯习的长文,声称其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概念的改进,帮助解释(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大量抉择的原因;(2)为何译者之间的翻译风格会有一以贯之的不同;(3)某个译者风格形成和技巧习得过程中复杂的内外力量一贯性的动力因素。西米奥尼通过研究翻译实践中译者认知和习得个人翻译技巧和风格的途径,引经据典,叙述了译者翻译行为与规范的关系,导出了惯习制约下的翻译技能习得原理,还认为惯习是通过特别的技能积累逐渐形成的。西米奥尼在深入追溯惯习概念产生的历史渊源的基础上,优化了惯习的定义,强调了惯习是“结构化了的(structured)”和“具有结构化功能的(structuring)”机制(mechanism),认为惯习概念并不有悖于功能导向的描述翻译学研究框架,相反还是其补充。盎基莱莉(2005: 125-145)在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及其与口笔译研究的关系的基础上,讨论了布迪厄的主要概念在社会学和哲学领域中对结构和能动性(structure and agency)之间互动关系所做的贡献;分析了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方法对社会学视角翻译研究客体的建构;探索了如何用布迪厄的概念进行口笔译实证研究以及在实证研究中如何贯彻布迪厄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基于对拉托尔(Latour)、鲁曼(Luhmann)和布迪厄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的异同分析,盎基莱莉点出了三者凸显译者角色的不同方式,主张布迪厄理论应是翻译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基础性理论起点。古安维克(2005: 147-166)抓住了布迪厄社会学实践理论的内外两个层面,即文本外部场域层面、内部的文本本身与文本生成的行动者及其惯习层面,用19—20世纪的美国文学经由翻译渠道在法国的场域建构,来分析美国和法国的文学场域对翻译的影响,着重分析了这期间司法场域对文学场域的审查。古安维

克分析了三位译者的惯习和他们的翻译行为对美国翻译文学场域在法国建构所做的贡献,认为幻象(illusion)是译者任务的主要目标,是场域的动力源。兼有双语文化惯习的译者通过翻译把源语文本植入目标语文化,从而导引目标语文化向着新的社会结构迈进。布鲁玛特(2005: 219-236)运用了布迪厄民族志认识论视角,认为应当把布迪厄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惯习”视为研究某一特定的民族志不可或缺的线索,由此,便可以找到探究某一社会的“声音”(voice)问题的绝佳路径。勒弗维尔(Lefevere)运用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来研究维吉尔(Virgil)的《伊尼德》(*Aeneid*)翻译,详细探讨了文化资本通过翻译传播、变形与读者需求、翻译赞助人和发起人以及源语、译入语文化及其语言的名声之间的关系(2001: 41-56)。把文化资本概括为“在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化过程后能使一个人为社会接受的那种东西”(2001: 42);还说“文化资本中首要的就是语言资本,而语言资本是一个人借以获得社会公认和推崇的手段”(2001: 43)。古安维克在《翻译研究的结构、建构主义模式》一文中提出了基于布迪厄“结构的建构主义”原则的翻译研究理论,诠释了场域中译者通过将其身体习得的倾向性(惯习)特征社会化,来形成与翻译行为和场域建构之间的错综复杂和相辅相成关系^①。古安维克还用实例证明了行动者(agents)在翻译场域中既竞争又合作地行使其权力的观点(2007: 93-102)。这些基于布迪厄社会学的翻译研究结论都是颇有见地的,极大地推动了翻译学科的发展。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晚,有的从宏观层面进行理论介绍、问题阐释或学科建构,如杨柳(2003)、胡牧(2006)、李红满(2007; 2008)、邢杰(2007)、武光军(2008)、王洪涛(2011; 2016b)、王悦晨(2011)、邵璐(2011)、唐芳(2011; 2012)、赵巍(2013)。有的运用社会学翻译理论解决翻译研究某一方面的实际问题,如刘立胜(2012)、邵璐(2012)、任文(2013)、鄢佳(2013)、王传英

^① 原文为“the notions of habitus and field are inextricably related. One cannot be conceived without the other.” (Gouanvic, 2007: 99).

(2013)、陆志国(2013)、骆萍(2010; 2013)、傅敬民(2014)、仲伟合与冯曼(2014)、屠国元(2015)、王洪涛(2016a)等等。

这些研究的一个共性就是将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及其关键概念嫁接到翻译学领域,并将其运用于翻译现象的研究,对社会翻译学的建构做出了很大贡献,使社会翻译学研究成为显学,也极大地推动了翻译学学科整体的发展,其贡献毋庸置疑。尽管如此,社会翻译学的主要关键词在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规范化定义,为了方便研究,下文将对部分主要关键词做一界定。

1.3.2.2 本书理论基础中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在翻译学和布迪厄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基础上,本书把场域、惯习、资本、同翻译学中的规范(布迪厄没有明确强调“规范”和其主要关键词的关系,也没有具体界定“规范”一词的范畴,但在他的作品中也大量使用“规范”这个概念)结合起来加以推演,得出一系列如译者场域、译者翻译场域、译者规范、译者翻译规范、译者惯习、译者翻译惯习、译者资本和译者翻译资本等概念,并逐一加以界定。

本书把译者场域界定为充满译者行为规范性因素的译者群体生存空间;把翻译场域界定为围绕某一翻译事件的所有规范性因素的效力所及空间。在这些场域^①中,所涉及的行动者和机构按照其各自的资本量占据相应的位置,且这些场域的本质都是相互关联和斗争的,都属于社会最高权力场域的子场域,它们自身也具有多个层次,可以析出各自的子场域。

译者规范是译者场域内译者的行为指南,它除了包括译者群体共享的普遍价值或观念、对译者行为正误或适当与否的看法等,也可以泛指规约所有译者的共同行为规范,或指某一具体的翻译事件场域中的所有规范性因素(如预设读者、赞助人、出版者、特定的诗学规范,以及译者将外在规范内化后在翻译中所遵循的具有个人

^① 对于布迪厄来说,“一个场也许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布迪厄,1997:142)

特色的惯性行为规范)。译者规范可以析出译者翻译规范,可以泛指规约所有译者翻译行为的规范,也可以指适用于特定翻译情形的规范性因素。也就是说,本书的规范(或称规范性因素)涵盖图里的侧重于文本的三大规范,也包括切斯特曼(Chesterman)侧重于期待性和职业性的两大规范。

译者惯习是指译者在生活、工作和教育体验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使译者以某些方式采取行动或做出反应的倾向性特性,是译者的第二本性,其本质特征是“一个具有结构和建构功能的机制(a structured and structuring mechanism)”(Simeoni, 1998: 21-22)。译者惯习里可以析出译者创作惯习、译者生活惯习和译者翻译惯习(特指涉及文本翻译处理时的一些倾向性特征)等,甚至包括更微观的惯习。

译者资本是译者所积累的劳动,它通常以译者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即“象征资本”)的形式存在着。当然,与布迪厄的资本层次性同理,可以从译者资本里再析出译者翻译资本、译者惯习资本(参考上文译者文化资本的第一种存在)甚至更微观的翻译能力资本等概念。当译者资本与某一翻译事件中的文本操作有关联时,便表现为译者的翻译资本。

场域、规范、惯习、资本是社会翻译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在某一场域内,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规范是最上位的概念,是译者个体惯习与社会发生关系的接口,它的有效空间规约着场域的边界;场域是围绕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受规范制约着的关系时空;译者在充满规范的社会中不断实践,体认并内化这些规范,从而在个体世界中结构化了一整套倾向性的社会特性,涉及译者在场域中的倾向性的那部分便是译者惯习;资本是译者在场域将各种规范因素内化并参与维护或构建场域内、进而构建场域间社会结构的工具,场域内所有行动者都有各自不同形式的资本。

在某一具体的翻译事件场域中,这些概念之间具体的工作原理是:占据不同位置的各行动者通过维持翻译规范或倡导新的翻译规范,在各自翻译惯习的调节下,形成特定的关系结构,争夺或维持